

学术支持:

清华大学新经济与新产业研究中心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改革和发展研究院
高级顾问:张文台(全国人大环资委第十一届副主任)
编委:管益忻 陈宇 刘涛雄 黄文夫 启文 赵红
李千 吴明伟 白卫星
编委会主任:管益忻
副主任:陈宇 刘涛雄 丁茂战
主编:管益忻
常务副主编:启文 副主编:白卫星
编辑部主任:廉明 副主任:刘立华
主编助理:方芳

經濟學家

周報

学术顾问:(按姓氏拼音排序)
 巴曙松 蔡继明 陈东琪 陈栋生 陈全生
 程恩富 迟福林 戴圆晨 范恒山 樊纲
 高尚全 顾海兵 葛志荣 谷书堂 贺茂之
 洪银兴 黄范章 贾康 江春泽 金碚
 李成勋 李江帆 李京文 李维安 刘诗白
 刘伟 茅于轼 任玉岭 宋洪远 宋守信
 宋养琰 谭崇台 王东京 卫兴华 魏杰
 吴澄 徐长友 晏智杰 杨家庆 杨启先
 张曙光 张晓山 张卓元 赵人伟 郑新立
 朱铁臻 周叔莲 周天勇 邹东涛

第159期(总第271期) 2016年7月29日 星期五 丙申年六月廿六 投稿邮箱:jxjzb@163.com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大慧寺路8号 邮编:100081 电话:010-62135959 本刊订阅方法:网易“云阅读”搜索“经济学家周报”即可订阅。本报所刊载文章系作者观点,均不代表本报意见。

培育国有经济新结构 寻求新的发展动力

2016年下半年国有企业经济的对策建议

■ 李锦

“十三五”开局之年,国有企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能否取得实质进展,对全局具有重大意义。今年已过半年,从经济运行看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特征更加明显,当前经济运行基本平稳,面对复杂的经济形势和诸多困难挑战,必须坚定信心、增强定力,全国一盘棋、上下一条心,尽快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新的突破。重点放在培育新的经济结构,强化新的发展动力上,保持精准发力、全力以赴地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对下半年国企经济形势预测

当前国企经济运行基本平稳,符合预期和中央对经济形势的判断。从趋势看,经济结构调整优化的前进态势没有变,国企改革正向纵深发展。但是,下半年投资紧缩,基础设施开工项目减少,经济下行已成定局。

一、预计2016年国有企业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为6%。一季度GDP是6.7,我们对2季度、3季度、4季度的预测为6.6、6.7、6.7,全年经济预测6.7。预计2016年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为6%。比2015年全年的6.1%继续回落,但增速已经基本触底。今年对工业增速的好利因素,一是联储加息预期减弱,美元至少在上半年大概率弱势;二是工业与投资存在一定联动性,基建和地产投资增速反弹,对工业品需求上升,实体层面需求扩张。不过工业增速难有显著突破,一是工业去产能仍是2016年、以及接下来数年的主基调;二是观察投资和工业品产量的联系,边际上投资扩张、拉动工业品产量上升的效用已经来到瓶颈;三是工业在经济中的占比正在下滑,从2015年开始工业增加值增速首次低于GDP。

二、预计国企制造业投资仍然延续下行态势,但下降速度放缓。制造业体量仍然是固定资产投资中占比最大的一块。预测2016年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速7.5%,房地产开发投资完成额同比2.5%,基建投资同比18%。从节奏上来看,2016年上半年,制造业投资仍处于触底修复的过程中,基建投资体量受季节性制约逐步反弹,在年中上升到最高,预测二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维持在10%左右。

三、结构性矛盾在碰撞,可望得到缓解。中国经济今年上半年的表现从总量来说有所反弹,但要解决结构性的矛盾,靠需求扩张是解决不了的。“去杠杆”各类举措刚开始布局,但宏观债务率却持续上扬,部分指标已经大

大超过警戒线,“降成本”展开,但各类宏观税负指标却在持续加重,企业总体盈利能力持续下滑;房地产投资增速超预期反弹,各类新开工项目大幅度上扬,但民间投资增速却直线回落;M2增速保持稳定,但M1增速却出现持续上扬,M1—M2缺口持续扩大。这些问题在下半年仍在延续,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三去一降一补”,就是要解决结构性失衡这个目前中国经济最深层次的矛盾。

四、价格效应将大大缓解国有企业的压力。

制造业供给结构产能过剩得到规模性推进。下半年,由于投资增速的回落和消费疲态的进一步延续,GDP增速将出现明显回落,预计全年GDP实际增速为6.6%,较去年全年下降了0.3个百分点,但由于价格效应,2016年GDP名义增速为7.5%,较去年全年提高了1.1个百分点。因此,从经济运行角度来看,2016年虽然延续了新常态艰难期不断探底的特征,但价格水平摆脱生产领域的“萧条”和消费领域的“低迷”,将有利于内生经济增长动力的启动。这种价格效应大大缓解各类型企业经济的压力。

五、短期国有企业产出还会继续下滑。从供给角度来看,除第一产业保持相对稳定之外,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基本上保持了持续回落的态势,特别是第二产业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作用下,去产能和化解僵尸企业直接导致短期工业产出出现明显下滑,预计2016年上半年工业增加值增速为5.9%,全年为5.5%,较2015年下滑了0.5个百分点,较2016年上半年下滑了0.4个百分点。

六、国有企业行业加快发生分化。第三产业继续超过第二产业。行业加快发生分化,有的哀鸿遍野,有的闷声发财。目前中国衰落明显的行业,2016年下半年或2016~2020年都将如此:能源行业,尤其是煤炭,原因库存多,相关产业冶金、焦化、电力需求乏力;钢铁、水泥、航运业,原因基础设施和房地产需求乏力;未来第三产业将有大发展,特别是网络零售业、娱乐旅游业、餐饮酒店、快递业、二手房服务、证券保险、移动互联网等。

各个方面要警惕经济增速进一步下行,以至于出现了内生性紧缩的过程。另一个方面也要注意到在稳增长取得比较明显成效的时候,根据供给需求结构性失衡,产业结构性偏低,产品结构性过剩,动力结构性错配,应该把更大的精力集中放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推进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要着力在改革上迈出实质性的步伐。为此,建议围绕结构调整,集中精力抓好六个方面工作:

一、发展以供给侧的管理和调整为方向,注重协调。

我们将始终面临两种选择:如果采取供给侧管理,总体上应保持需求紧缩,带动市场竞争加剧,通过淘汰劣质产能推动结构升级,但在短期困难增大情况下,宏观短期目标可能受损。相反,如果短期刺激力度过大,市场需求活跃,大量低能低效的供给就可能死灰复燃,偏离供给管理的目标。如果割裂地看待需求侧和供给侧管理,“需求侧的短期活跃,有可能成为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障碍。反过来说,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可能变成实现短期经济增长目标的阻力。显然两个方向都需重视,但在周期性矛盾和结构性矛盾并存,且主要问题是结构性问题的当下,主要的解决措施应该是对供给侧的管理和调整,把改善供给结构作为主攻方向。

今年以来,围绕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重点任务,国家层面相关政策相继出台。其中,去产能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首要任务,相关工作机制已经明确,政策体系已较为完善,应当取得明显成效。如此背景下,能否矢志不渝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取得成功,就成为“十三五”乃至更长时间解决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要害。

二、创新以寻求发展新动力为导向,注重投资。

经济新常态可以从“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力转化”三方面去把握,最终决定于动力转化。从国企动力转换看,必须改变过去大量依靠资本、资源和劳动力投入的做法,让创新成为国企经济发展的动力。而国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领域是制造业,必须加快调整制造业经济结构、培育形成新的制造业增长动力和竞争力,发挥“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突围的潜能和优势。面临经济增长的新动力的形成和旧动力的逐渐弱化这两股力量的双重交织,要着力寻求国有经济发展新动力。特别是加大“短板”与新兴产业投资。智能

制造和战略新兴产业这类潜在新增长点需要加大力度发展,同时国企的短板尤其是高技术含量的短板需要加大投资补齐。产能过剩不是因为投资而是因为投错了地方,新工艺、新技术、重大短板和产能不足的产品仍有较大投资缺口,建议加大“定向”投入。对于国家战略需要、央企有优势的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比如航空航天、核电、高铁、新能源、新材料、智能电网等,肯定要加大投入力度。

三、调整以优化结构框架为主导,注重重组。

经济结构调整是破解国企增长困局的关键之举。要着力推进结构调整,多策并举加快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中央要求国有企业要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发挥带动作用。以加快企业战略性重组为重点,加大力度,通过创新发展一批、重组整合一批、清理退出一批来优化布局。压缩过剩产能是供给侧改革的“当头炮”。对于央企长期亏损和资不抵债的低效无效资产,加大处置力度,积极化解过剩产能。一些企业在特殊时期盲目投资形成了落后产能,背后是市场失灵与政府缺位同时存在,标准过时和难以落地同时存在。压缩过剩产能应以清理僵尸企业和落后产能为目标,存量方面分类处置:一是对于僵尸企业,通过破产清算和兼并重组相结合的方式解决;二是对于一般高杠杆企业,调整自身业务结构,通过兼并重组、盘活存量、债务结构调整等方式进行杠杆调整;三是对于发展前景不错,但现在杠杆率比较高,遇到了暂时性困难的企业,通过债务重组降低杠杆率。以多兼并少破产的方式重组减少资源浪费,力争退出过程平稳高效。

四、管理以提高效能为引领,注重提质。

保证国企大局稳定的改革与发展的基本要求。在国企制造业面临巨大困难、还有不少问题的背景下,首要的任务是保证国企的整体稳定,改革稳步推进,供需不出现撕裂性的波动、多数优质企业能够渡过难关。在此基础上,下大力气瘦身健体和降本增效,加快发展历史遗留问题。目前,国企管理层级多、冗员过多,法人链条长、管理效率较低,加上“三供一业”分离移交,管理企业、办医疗和教育机构、退休人员实行社会化管理,以及厂办大集体改革还有大量工作要做。持续攀升的生产要素成本严重削弱了企业的盈利能力,降低成本成为降本增效的根本措施。降成本方面,1~4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主

营业务成本85.66元,比去年同期下降0.24元。5月份开始全面实行“营改增”后,今年将为企业减负6000亿元左右。中央有关部门推进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减免、电价改革等,都有效降低了企业成本。今年以来,通过实施煤电价格联动、统筹利用化肥优惠电价等腾出的空间,两次降价合计可减轻工商企业电费支出470亿元。目前看,在导致企业成本高企的原因中,劳动力、土地等成本的持续上升是刚性的,短期内很难降低;但交易成本、各种税费、社会保险等费用有很大的下降空间。国企要配合国家降成本措施,综合采取各种方式,打好“组合拳”,使国企提质增效落在实处。

五、改革以增强活力为目标,注重突破。

今年是国企改革的落实年,要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突破。改革的根本目的还是发展生产力,不能为改而改,还是要结合实际选择各自的突破口和切入点。不要面面俱到,要对准活力不足,包括政企不分、政资不分,管理错位、越位、不到位等关键问题下功夫。无论选择什么突破口和切入点,都要围绕如何增强活力、优化布局、提质增效来深化改革。要依靠全面深化改革,从体制机制入手推动简政放权、国企改革、创新驱动发展等,为培育新的经济结构、强化新的发展动力释放改革红利。国企改革试点是下半年的重要任务,能不能迈开步子,趟出路子,影响着国企改革的威力与信心。政府不能把改革审批权死死抱在怀里。长期以来,行政审批制度的改革在横向分权与集权、纵向放权与收权之间徘徊,供给侧改革应当从根本上改变这种循环。政府在国企改革中的正确做法是“抓紧所有权,放开经营权”。应当对所有市场主体能够自主决定的经营事项一律取消审批。只有这样,才能激发国企改革的活力、从根本上解放国有企业的生产力。

整个下半年,国有企业都面临供给侧需求侧的矛盾。供给侧改革是宏观政策主攻方向,需求侧管理是合理增长区间内的托底手段,只有辩证地处理好二者关系,坚定不移地推进供给侧改革的核心目标,才能使国有企业经济结构转型再上新台阶。

显然,进入新常态的中国国有经济“大船”已经转向全新发展阶段,这种掉头转向在整个下半年仍然处在行进中,“大船”的动力和承载力能否承受住巨大转向力而实现平稳改速,还要面对持续考验。

英国脱欧导致中国必须重新考虑和英国的贸易关系框架,这是两国认真商谈全面自由贸易协定的最佳时期。

脱欧:中英自由贸易协定的良机

■ 王江雨 新加坡国立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2016年6月23日英国全民公投决定脱欧,如同任何天翻地覆的重大历史事件一样,英国脱欧的后果也必然是几家欢乐几家愁。从中国的角度看,以前在贸易上基本把欧盟作为一个整体来交往,英国只是欧盟一个成员。而且鉴于欧盟条约要求贸易政策完全在联盟层面制定(这包括贸易协定的签订),成员国基本上被剥夺了独立行事的权力,所以中国也不可能有单独的对英国贸易政策。但现在情势已然发生如此剧烈变迁,中国必须重新考虑和英国的贸易关系框架。以笔者之见,现在是中国与英国开始认真商谈一个全面的自由贸易协定(China-UK FTA)的最佳时期。在当前情势下,这样一个协定既可行,又必要,甚至其开始谈判本身就能给中英双方创造巨大的双赢,也能在很大程度上弥补因为英国脱欧的不确定性给双方造成的影响。

对中英双方来说,一个自由贸易协定首先最大程度地符合两国现在的战略需要。英国脱欧大局已定,目前亟需在国际上寻找其他友好国家的支持,尤其是那些实力较为强大的国家。发展与中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已经成为英国缓解脱欧不良后果的必需品。一个自由贸易协定,可以将英国与中国的互惠经贸合作关系制度化,从经济上“绑定”中国这个贸易伙伴。对中国来说,为了实现强国梦,不管是称之为“大国崛起”还是“民族复兴”,与世界上最主要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一建立更紧密的合作关系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经

济上都具有巨大的战略意义。尤其是在如今因为南海和东海问题受到美日围堵的局面下,强化与英国的合作,将中英关系进展到自由贸易协定的层面,既符合中国的“一带一路”大战略,又防止目前与美日在某些问题上的冲突被转化为与整个西方的摩擦。此外,与英国的自贸协定能向国际社会展示中国的经济实力、贸易自由化和规则化的政治意愿,以及在贸易协定方面的谈判能力,它会在国际上造成巨大的示范效应,为中国与其他发达国家谈判自贸协定铺平道路。

其次,一个自由贸易协定也符合中英双方的经济需求。首先要明白的是,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实现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与西方老牌发达国家英国在国际贸易上是天然互补的。中国的物美价廉的工业产品和消费品能帮助英国人民以较低成本维持生活水准,而英国发达的金融业、服务业与高科技产品又恰是中国需要加强的地方。即使英国离开欧洲,它也仍然是世界上最大和最成熟的市场经济之一,是拥有国际金融中心和高科技行业的西方大国,其本身的经济体量也不可小觑。简而言之,中英自贸协定能够在最大程度上让双方实现各自的比较优势。

英国目前面临的最大的困境之一就是对外贸易关系。欧盟一向是英国最大的市场,但现在脱欧即意味着英国也要脱离具有欧盟对外统一关税、对内无贸易壁垒的共同市场,英国与欧盟的贸易关系将在何种框架下进行,这还是一个需要双方具体商谈的问题。毋庸置疑,这个商谈将会是一个艰难和冗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英国无可避免地要降低对欧盟市场的依赖和寻求其他市场,而中国是无可替代的最佳选择。

第三,中英自贸协定在政治上的阻力最小。总体上讲,中国现在对与他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相当热心。在世界贸易组织(WTO)止步不前和美国主导的TPP将中国排除在外的情况下,致力于FTA无疑是正确的战略选择,而无论从英国的国际地位和市场规模来看,中英FTA都可谓是皇冠上的一颗明珠。从英国的角度看,它几百年来一直奉行自由贸易原则,在最早期时甚至是单边开放(以1846年废除重商主义的《谷物法》为标志)。贸易保护主义在英国从来都不是主流声音,因此不太可能像美国政客和民众那样对中国签订贸易协议表现出歇斯底里的反对态度。再者,英国目前的民情民意也不存在反自由贸易的问题。英国公众对欧盟的不满,主要集中在移民和承担的欧盟会费两大问题上,并没有人责备英国的对外贸易政策。在欧盟大国中,英国基于其自由贸易的坚定信念,对华经济政策向来开放宽松,较少政治化色彩。如英国从来没有对中国企业在英国市场上的经济行为实施政治限制,如中国企业华为,在英国畅通无阻,而相形之下却在美国市场上因为美国政府的投资审查制度和政客的反对而寸步难行。在欧盟内部,英国经常反对欧盟对中国采取反倾销、反补贴等贸易限制措施,在授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和中欧投资协定上让双方实现各自的比较优势。

英国目前面临的最大的困境之一就是对外贸易关系。欧盟一向是英国最大的市场,但现在脱欧即意味着英国也要脱离具有欧盟对外统一关税、对内无贸易壁垒的共同市场,英国与欧盟的贸易关系将在何种框架下进行,这还是一个需要双方具体商谈的问题。毋庸



协定谈判问题上持相当积极的支持中国的立场,而且英国也是首先公开支持和加入亚投行的西方国家。种种迹象表明,中国与英国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政治上在英国内遭遇到了的反对可能最小,而西方大国中英国在这方面几乎是独一无二的。

当然,尽管英国人民已经通过公投达成脱欧的决定,在法律上英国与欧盟正式分手也是一个漫长的历程,可能要耗时5到7年。在这个过程中,英国和欧盟会多次谈判,反反复复,其中一种可能性就是英国与欧盟达成一个能够为脱欧派所基本接受的协议,最后英国再举行第二次公投,其结果可能是废弃第一次公投结果,英国还留在欧盟,回归欧盟的统一贸易政策,从而也就失去了和中国谈判自贸协定的权力,中国最后竹篮打水一场空。但笔者以为,这对中国也不是损失,原因有三。第一,如前所述,与英国开始谈判自贸协定,这本身就有巨大的示范效应,能够提升

中国在国际经济游戏中的谈判地位,甚至是改善中国经济体制在国际社会的观感。第二,和英国开谈自贸协定,能够锻炼一大批国际协定的谈判人员,为中国以后可能四面开花的贸易谈判储备人才。第三,无论最后是否谈成,这场谈判都能大幅度密切中英双方的贸易关系,以及贸易官员之间个人的联系,最终还是能使中英经贸关系更上层楼。综上所述,既然英国公投已经通过退出欧盟,就必然要启动历时数年的脱欧法律程序,同时英国也必然要为最终离开欧盟的可能性做好准备,包括寻求国际支持和替代市场。在这个时候,如果中国能积极与英国接触,双方开始谈判一个综合性的高端的自由贸易协定,必定能产生巨大的双赢结果。英国公投脱欧虽然不见得一定对英国、欧盟和中国是好事,但它却为中英自贸协定的开谈制造了一个天赐良机。对中英双方来说,这个机会的窗口期也不是很长,需要双方赶快行动。